



古代文人如何看重阳

□徐铁狄

唐代诗人孟浩然在《过故人庄》中写道：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赏菊是重阳节的一项传统习俗，这些天，京城一些公园已经开始举办菊花文化节，堪称菊舞金秋花满园。古时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、秋游赏菊、拜神祭祖及饮宴祈寿等习俗。文人们也吟诗赋诗，留下千古佳句。

王维头上插茱萸

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久远的远古时代，最早是作为祭祀活动而存在的仪式。一种观点认为，重阳节由远古先民对火的崇拜演变而来，这可以在部分江南地区的重阳祭灶习俗中找到佐证。

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，千百年间，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坚实厚重的农耕文明。中国国土主体位于北温带，这里四季分明。在劳作中，通过对季节、作物生长节律以及月相、星象周详而准确的观察，人们创造出了一种阴阳兼顾、日月并行的独特历法。依照这部历法，九月初九日恰逢仲秋之时，将这个日子定为节日，显然有庆贺收获、放松休憩的意思。这是一年之中最好的一段时光，溽热消退、秋高气爽，加之相对闲暇，故多有饮宴。而且“九”这一数字还有特别意义，“九”为阳数，又为“数之极”，双九相叠，其意味愈加彰显。早在曹魏时期，魏文帝曹丕在《九日与钟繇书》中这样说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

中国古代文人对重阳节异常重视，这从相关文章、诗作数量之多可以印证。其中王维的那首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最为有名：

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王维出生在蒲州（今山西省永济市），十五岁时与兄弟王缙去长安，此诗作于他十七岁时，当时王缙返回蒲州，王维独在异乡，恰逢重阳节，遂有感而发。诗中所谓的“山东”，不是现在的山东省，也不是历史意义上的太行山以东，而是华山以东。山西晋南一带恰在华山的东向偏北，彼时便被王维称作山东。九九登高，时俗是要在头上插戴茱萸，或装在囊中佩戴于身上。茱萸是一种灌木，也是药材，戴在身上可以起到“辟热御寒”的功效。王维二十一岁考中状元，后来做到尚书右丞这样的四品高官，一生在异乡生活。但从这首诗可以看出，在他的内心很难忘掉家乡、忘掉儿时的小伙伴，这首诗非常准确地描摹了人的思乡之情，而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，让这首诗成为家喻户晓、流传至今的佳作。

王维有“诗佛”之称，且诗书音画俱佳，还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山鼻祖。安史之乱中，他曾被安禄山强委伪职。其间他曾私下作《凝碧池》诗一首，因此被朝廷豁免了他的附逆之罪，也算是因“诗”获救吧。

赏菊和饮酒是诗人最爱

唐朝诗人杨衡也有一首诗提到茱萸，诗名《九日》：



▲顾洛《敬老图》

黄菊紫萸傍篱落，摘菊泛酒爱芳新。不堪今日望乡意，强插茱萸随众人。

杨衡同样也是漂泊在外，他只是随着众人勉强插了茱萸。他的心思在菊花身上。菊花也是可以戴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泡酒。

杜牧有一首《九日齐山登高》：江涵秋影雁初飞，与客携壶上翠微。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但将酩酊酬佳节，不用登临恨落晖。古往今来只如此，牛山何必独沾衣。

诗中杜牧也提到菊花，而且是“须插满头归”的。但人们不难看出，杜牧，包括上面说到的杨衡，他们心不在菊而在酒，他们是要“但将酩酊酬佳节”的。

中国的造酒技艺起源很早，夏朝时的杜康就是传说中的造酒始祖。考古发掘中，更是早在石器时代便有盛酒器具的存在。但在古代，长期以来酒的度数都不是很高，最高也就十几度，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大碗喝酒的豪杰了。不过喝酒却有颇多讲究，比如过年喝的屠苏酒，据说是华佗发明的一种药酒，大人小孩都能喝；端午要喝艾酒和雄黄酒，一种是用艾草泡制的酒，一种是用雄黄研末泡制的酒，这些酒都有驱疫辟邪作用；而到了重阳，就要喝菊花酒了。

传说重阳饮菊花酒的风俗源自汉官。据西汉刘歆所著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戚夫人（刘邦宠妃）侍儿贾佩兰，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，说在宫内时，九月九日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云令人长寿。”而在南梁吴均所著《续齐谐记》中还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，长房谓曰：‘九月九日，汝家中当有灾。宜急去，令家人各作绦囊，盛茱萸，以系臂，登高饮菊花酒，此祸可除。’景如言，齐家登山。夕还，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。长房闻之曰：‘此可代也。’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，妇人带茱萸囊，盖始于此。”桓景是东汉时人，由此看来，重阳登高、插茱萸、饮菊花酒的风俗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完全定型。

民间还有说法，称菊花为“延寿客”，茱萸为“辟邪翁”。宋朝吴自牧所著《梦粱录·九月》云：“今世人以菊花、茱萸，浮于酒饮之。盖茱萸名‘辟邪翁’，菊花为‘延寿客’，故假此两物服之，以消阳九之厄。”

杜甫有一首七律《九日五首·其一》：重阳独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台。竹叶于人既无分，菊花从此不须开。殊方日落玄猿哭，旧国霜前白雁来。弟妹萧条各何在，干戈衰谢两相催！

这首诗是杜甫困苦病痛时的境况写照，既想饮酒又饮不得酒，既想登高也只得江上台。战乱中弟妹离散，自己又沦落夔州。面对盛开的菊花，心中想，还是别开了吧！

李清照重阳赋心声

唐德宗李适是个有作为的皇帝，也能写诗，《全唐诗》中录有他的作品。他有多首关于重阳节的诗，诗句有诸如：“重阳有佳节，具物欣年丰。皎洁暮潭色，芬敷新菊丛。”“爽节在重九，物华新雨余。清秋黄叶下，菊散金潭初。”“令节晚澄霁，四郊烟霭空。天清白露洁，菊散黄金丛。”诗句中全都提到了菊花，可见菊花与重阳节是何等的密不可分。

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是写菊最出名的诗句。辞官隐居，怡然自得。但终因家贫，重九日只有菊而无酒，于是写下一首《九日闲居·并序》，诗中“酒能祛百虑，菊解制颓龄”句，写出酒与菊之美妙之处，奈何“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”，唯写诗寄怀而已。不料江州刺史王弘差人送酒，于是陶渊明开怀畅饮，大醉酩酊。差人身着白衣，便是“白衣送酒”的典故。

李清照有一首重阳词《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》，更为有名：

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

李清照十八岁时与赵明诚结婚，而后赵明诚外出做官，夫妻分离。第二年重阳节，因思念丈夫，李清照便写下这首词。据说赵明诚收到此词，依样又写了数首，然后将所有词章不做说明，一并拿给好友陆德夫看。陆德夫品味后说：“只三句绝佳。”赵明诚忙问是哪三句，陆德夫回答后，赵明诚不禁哑然。原来正是李清照的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。

唐代文学家司空图是王维的同乡，他的《诗品》认为含蓄的主要特征是：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。语不涉难，已不堪忧。”而到宋朝，李清照的《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》没有一个字写相思情，却又每个字都浸透着离别苦，细细寻味，实有浓浓的思念之情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赵明诚和李清照均为金石学的代表人物，共三十卷的《金石录》就是他们夫妇共同完成的。《金石录》一书，著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，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，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。（《北京晚报》）

谈古论今

人类与疼痛的斗争

公元前2250年，一块古巴比伦黏土板上记录了一种治疗牙齿“蛀虫”的方法——用乳香和天仙子（一种可止痛、有毒的草本植物）粉末一起填补龋齿的蛀洞。据说这是已知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止痛秘方。

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于“止痛”的研究，为了止痛也干过不少“傻事”。

公元46年，古罗马医生斯科尼波利乌斯·拉杰斯为了止痛开创了头痛和痛风的电疗法。在他的医学书籍《医学精选》中记载，他将电鳗放在病人的眉心或足底，让电鳗放电，直到病人的感官麻木。拉杰斯认为，电击可以促使内啡肽的释放，从而缓解疼痛。

除了用电击，还有靠呼吸止痛的方法——1798年，气体麻醉止痛诞生了。英国化学家汉弗里·戴维（Humphry Davy）被称为气体麻醉先驱，他测试了吸入一氧化二氮的影响。这种气体使他傻笑并头晕目眩，所以以一氧化二氮又称笑气，但同时减轻了智齿的剧痛。

当然，这些“小伎俩”在吗啡面前都是小儿科。吗啡堪称止痛神药，其止痛效果是鸦片的十倍，性质更为稳定。吗啡一经问世就成了镇痛药的主力军，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被广泛使用，后果可想而知，一场大规模的滥用，导致“吗啡成瘾”像瘟疫一样在士兵中蔓延。如今有不少国家对吗啡的处方实施了法律限制。

幸好没过多久，新的止痛神药阿司匹林就问世了。1899年，德国拜耳公司发明了阿司匹林，宣称这是“不会上瘾的咖啡”。这个药起源于古老的止痛剂——柳树皮。柳树皮粉末含有止痛成分水杨苷，拜耳对其优化，创造了低毒性的乙酰水杨酸。自此，阿司匹林便成了全球使用量最多的药物之一。

而被大众广泛认识的镇痛药布洛芬，它的发明则来自一场宿醉。

1962年，英国化学家斯图尔特·亚当斯（Stewart Adams）和同事们刚刚合成了一种叫作“对异丁苯丙酸”的化合物，宿醉之后头痛难忍的斯图尔特试着服用了600毫克，没想到效果超出意料的好。兴奋的斯图尔特和团队立即继续推进研究，异丁苯丙酸很快就通过了临床试验，于是有了布洛芬。布洛芬以其便宜的价格和快速的镇痛作用，逐渐开始风靡世界。

如今，应对轻症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热，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是国际医学界达成共识的主流药物。（《新周刊》）

生活史

古代“交通肇事”如何惩罚

很多人认为，关于道路的规定是起源于近代社会汽车的发明，其实不然，在古代社会中，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道路交通基本规则，其中很多制度经过演变，仍然持续影响着现今社会。

古人违反交规，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。秦朝的《除吏律》规定，御人技术四次不过关，撤销驾驶资格，罚四年徭役并处罚金。

唐朝沿用了《晋律》中“禁马众中”的法律规定，禁止车、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地方高速行驶，否则将被用竹板或者荆条打50次脊背，后来改为打臀部。有公文传递、朝廷命令发布、有病求医等特殊情况的，交钱赎罪。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，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，造成牲畜财产损失的也要赔偿。

唐朝对客船、商船也规定了超载处罚，超50斤货物或者一个人，打船主50板子，超100斤或者两个人，打100板子，因此类推，最严重的坐牢2年。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，因为天气原因骑马撞伤人的，赔偿医药费和坐骑；造成人员死亡的，打100大板，坐牢3年，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，官府没收坐骑。

古人习惯靠左行驶。清朝末年，政府成立巡警部，用洋人做顾问，颁布的是欧洲式的交通规章，道路通行从靠左行驶变为靠右行驶。后来沿袭了这一规则。（《老年生活报》）